

韩愈传

一、出生钟鸣鼎食之家

韩愈，字退之，是我国中唐时代杰出的古文家、诗人、哲学家。

他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（768），距李白之死六年，下距杜甫之死三年、柳宗元之生五年。从他出生到穆宗长庆四年（824）去世的五十七年中，经历了代宗、德宗、顺宗、宪宗、穆宗五朝。这时唐代社会经过“安史之乱”的十年浩劫，为旧时史家称道的“唐代盛世”，已经一去不返。贞元、元和时期，虽号称“太平”、“中兴”，社会经济稍有恢复，但社会并不安定。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藩镇，依然抗拒中央政令，大搞分裂活动。后来宪宗虽采取分化和征讨兼施的政策，使藩镇在表面上归顺中央，但他们拥有财赋和重兵的情况，并没有根本性改变。朝中宦官，更是飞扬跋扈，他们不仅拥有常备武装，而且握有实际的政治权柄，甚至连皇帝的废立、大臣的进退，也得由他们来决定。佛教和道教，在这个时期中也非常盛行。大地主和佛道寺院兼并土地，侵吞税户，“国赋散于权门，王税不入天府”（《旧唐书·韦皋传》），十分天下之财，而佛有七八（《旧唐书·辛替否传》），人民困苦不堪。唐代的科举制度，虽然为中下层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创造了条件，但取士之法，“必举于州县，然后升于礼部、吏部，试之以绣绘雕琢之文，考之以声势之逆顺、章句之短长，中其式者，然后得从下士之列。虽有化俗之方，安边之画，不繇是而稍进，万不有一得焉”（韩愈《上宰相书》），而某些掌握朝政的门阀势力，仍坚持朝廷显官须由公卿子弟为之，因而想通过科举词采进身的知识分子，往往遭到排斥和压抑，或沉沦下僚，或终身埋没，郁郁不能得志。这样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，对韩愈的生活道路、思想、创作，是有巨大的影响的。

韩愈出生在一个钟鸣鼎食、世代簪纓之家。他的七世祖韩耆，后魏时任常山太守，封武安成侯。六世祖韩茂，以武功显赫，曾任尚书令，封安定桓王。五世祖韩均袭爵，任定州刺史、金部尚书，封安定康公。高祖韩駿，任唐朝银青光禄大夫、雅州都督。曾祖韩泰任曹州司马。祖父韩睿素任朝散大夫、桂州都督府长史。父亲韩仲卿，历任武昌令、鄱阳令、秘书郎，赠尚书左仆射。长兄韩会，曾任起居舍人，次兄韩介，曾任率府参军。封王拜侯，自然是朝廷显宦，刺史、县令也算得上地方要员，至于司马、长史、起居舍人、率府参军之类，则是仰人鼻息的佐贰官，品阶已经很低了。尽管韩家已经式微，官越做越小，但毕竟祖孙八代都是官宦，不是白衣，一般人家是很少有此辉煌历史的。

韩愈的父亲仲卿昆仲 4 人，仲卿居长，以下依次是少卿、云卿、绅卿。仲卿兄弟卓犖不群，都曾居官，皆有惠政。仲卿的父亲睿素所任的桂州都督府长史，在当时是执掌一方兵权的要员，仲卿只当过武昌、鄱阳县令一类的低级官员，没有父亲显赫。位卑未敢忘忧国。仲卿是从县尉调任武昌县令的，县尉是县令的属官，职掌是分判众务，催征租赋，仲卿任此职时，空有满腹经纶，却无处施展抱负，只能徒呼负负。尽管如此，他仍干得很认真，上司很欣赏他的才干，不久便从潞州铜鞮尉调补武昌县令，算是升了官。

仲卿的弟弟少卿，曾当过一任当涂县丞。县丞也是县令的属官，是个不人流的芥微小官。尽管位卑职微，少卿却狷介耿直、办事认真，赢得了同僚和百姓的一致赞誉。李白用“感慨重诺，死于节义”8 个字来概括他的为人。

云卿曾任礼部侍郎，在肃宗、代宗朝是文章官，也是一位斫轮好手。

绅卿的经历有些传奇色彩，韩愈说他这位叔父“文而能官”，既能写文章，又深谙为官之道，是很难得的人才。

韩愈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，不可能不受父祖辈的熏陶与影响。

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文学。父亲自不必说，叔父云卿的文章也名噪一时。御史中丞田神功平刘展之乱于淮南，云卿写了《平淮碑》又写成《丞相赠太子太师崔圆庙碑铭》，汪洋恣肆，议论风生，赢得了许多人的赞叹。大诗人李白说：“云卿文章冠世。”李白生性耿直，从不媚世趋时，这个评价当是发自肺腑之言。另一个叫李翱的人则称赞云卿“其文章出于时，而官不甚高。”意思是说云卿学问甚大，而官职却太小。韩愈对这位叔父更是推崇备至，说叔父的文章在代宗大历年间独步一时，天下之人凡打算立碑纪念其祖先嘉言懿行，以便垂名后世者，莫不顶礼膜拜于云卿之门，一时洛阳纸贵。

韩愈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，耳濡目染，尽与写文章有关。他后来成为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古文运动倡导者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韩愈既生于仕宦之家，他的童年应该是在无忧无虑中度过的。可是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大历五年（770）韩愈刚刚3岁，他的父亲仲卿突然撒手而去，这对韩家是不小的打击。因此，他只好跟随长兄韩会回河阳故里，赖兄嫂抚养。七岁，韩愈又随兄居京师，开始刻苦读书。十二岁，韩会因党附元载之嫌，被贬为韶州（今广东曲江）刺史，他随兄嫂同抵贬所。未几，会病卒，又随寡嫂郑氏北归河阳。时值中原战乱，遂南下宣城，靠祖传薄产维持生活。这些经历，说明韩愈早年的生活是极不安定的。但正是这些颠沛流离的孤苦遭遇，激发了他刻苦好学、关心现实和勇于探索的进取精神。

二、年少刻苦好学

韩愈出生在簪缨世家，虽然到韩愈时已经式微了，但是勤奋读书的传统却保留了下来。他的父兄饱读诗书，满腹经纶，在困顿落魄之中也不废攻读，不能不给韩愈带来深刻影响，加上他天资聪颖，过目成诵，7岁开始读书，又笃志嗜学，成绩便不同凡响，赢得了人们的一致赞誉。不少文章都说，7岁的韩愈写起文章来，能够别出机杼，自成一格。之所以如此，与他所处的环境大有关系。他虽出身官宦之家。但此时已经式微，父母早亡，孤苦无靠，只得依哥嫂读书。穷困的生活促使他宵衣旰食，奋发淬砺，篝灯展卷，日以继夜。加上他又博闻强记，触类旁通，因此，年龄稍长，便能通《六经》、百家之学。时人的记载可能有溢美的成分，但是韩愈既聪颖又勤奋，成为一代宗师，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韩愈自己也说：“读书著文，自七岁至今。”又说自己“口不绝于六艺之文，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，记事者必提其要，纂言者必钩其玄。贪多务得，细大不捐，焚膏油以继晷，恒兀兀以穷年。”成如容易却艰辛。韩愈后来有那么大的成就，是和他年青时刻苦读书分不开的。

韩愈虽然7岁时就开始读书，但萍踪浪迹，迁徙不定，学业只能时辍时续。在长安的3年中，是韩会42年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日子，以文会友，政务丛脞，未必顾得上辅导胞弟韩愈读书。以后贬谪韶州，人地生疏，心情悒郁，只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便殁于任上，韩愈也不会学到很多东西。从韶州回到河阳，席不暇暖，便又逃难宣城，干戈纷扰之中恐怕也是读不成书的。韩愈真正有机会坐下来钻研经史，当是在避难宣城时期。

韩愈在到宣城时曾师事讨窦牟。窦牟弟兄4人，其中3人因

善于辞赋而进士及第，这 3 人是窦牟与其兄窦常、弟弟窦巩。一门三进士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，在士林中传为佳话，因此，韩愈慕名前往谒见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韩愈是在宣城后不久认识窦牟的，当在 15 岁左右，时为建中三年（782）。窦牟歿于长庆二年（822）终年 74 岁，建中三年为 33 岁。韩愈说的“实自童蒙”大概就指 15 岁时。窦牟循循善诱，使韩愈如沐春风，便有了荀子所说“蓬生麻中，不扶而直”的感觉。他对窦牟甚为崇敬，自视为刚刚破壳而出，须要哺食的“雏鷇”，而窦牟则是翱翔蓝天的飞鸿。40 年之后，韩愈回忆受业情景，仍历历在目，恍如梦中，可见他对老师有多么深厚的感情！

韩愈自己说，他是个布衣之士，7 岁时便开始读书，13 岁上便能写文章了。古代有不少大手笔，但 13 岁便能写文章的还不多见，韩愈能做到这一点，自然不同凡响。不过就他的阅历和根基来看，13 岁时写出的东西怕是很浅薄的。他的集子里没有注明哪篇是他早年的作品，可能已经散佚了。他又说，我十六七岁时，对世事知之不多。十六七岁时还懵懵懂懂，虽读圣人之书，却弄不清其中的底蕴，以为凡是出仕做官的人，都有救焚拯溺，民胞物与的情怀，完全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，他把当时的社会想象得过于美好。就凭这一点，也可证明他在 13 岁时写不出其真知灼见的文章来。

宋人王十朋说，韩愈的《感二鸟赋》乃是少年时所作，因学识不够故有“余生命之湮阨，曾二鸟之不如”之叹。但韩愈在这篇文章中已经清清楚楚地说明，该文写于贞元十一年（795）五月戊辰，当时韩愈是 28 岁，将要进入壮年时期，已经不是少年了。

三、求仕登第

学成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。先读书而后步入仕途，是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的惟一出路。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悬梁刺股，囊萤映雪，凿壁偷光，给后人留下一段段佳话。当然，权贵之家的子弟自有做官的终南捷径，用不着受那么多酸辛和苦楚，一般的知识分子是没有这种机遇的。韩愈在宣城度过了5年的读书生活，他踌躇满志地说：“忽忘身之不肖兮，谓青紫其可拾。”不肖”是自谦之词；“青紫其可拾”是说摘取功名富贵如拾草芥。《汉书·夏侯胜传》就说：“士病不明经术，经术苟明，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。”韩愈把现实想象得过于美好了，他哪里知道通往仕途的路上荆天棘地，有许多坎坷呢？

贞元二年（786），19岁的韩愈离开宣城，只身向京城长安进发，以实现他取青紫如拾芥的夙愿。京师乃天子所居之地，人烟辐辏。韩愈要在这里猎取功名富贵，必须先有个安身之地，他马上想起了当时任殿中侍御史的父亲韩弇。韩弇是韩愈的叔父云卿之子，关系当然非寻常人可比，韩愈投奔他，也是很自然的。

可惜，韩愈风尘仆仆赶到京城时，韩弇却去了河中（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）弟兄两人失之交臂，未能见面。

韩愈单人独骑来到长安，这里米珠薪桂，居大不易。他举目无亲，看到那些权豪富贵之家轻裘肥马，仆从如云，自己却困顿风尘，三餐不继，顿时产生了“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”的凄凉之感。

长安有人口百万之众，但没有一家是韩愈的亲朋故旧，没有一个人对他施以援手，脱他于困厄之中。韩愈并不喜欢寡居独处，但是那些达官显宦无人肯与他这个穷困潦倒的书生结交，他只能徒

叹奈何。不过，韩愈并不悲观沮丧，怨天尤人，他坚信只要努力读书，终究会有否极泰来的日子：

出门各有道，我道方未夷。

且于此中息，天命不吾欺。

人生的道路各不相同，有的一帆风顺，有的处处受阻，有的先苦后甜。韩愈猜测自己的道路是目前尚不平坦，但冥冥之中的天帝是不会欺骗读书人的。

要在京师读书，首要的前提是衣食无忧，而韩愈阮囊羞涩，饥肠辘辘，自然无法继续读下去。好在当时的北平王马燧是其堂兄韩弇旧友，于是，百无聊赖之中，他忽然萌生奇想，何不去求北平王马燧帮忙？说不定马燧会产生恻隐之心，助自己一臂之力，即使不成功，也不会有什么祸患，至多是招来一顿羞辱罢了。想到这里，韩愈顿时信心百倍，有了绝处逢生的感觉。但如何才能见到马燧呢？登门求见？恐怕侯门似海，马燧未必能降尊纡贵，亲自接见，最稳妥的办法是在马燧出朝时拦住马头，向他诉说自己的境遇。当然，这个办法并非善策，但是事到如今，成败利钝，在此一举，别无计策可施了。

说干就干，韩愈从此留心马燧的行踪，终于有一天在大街上拦住了他的坐骑。

一提起来韩弇的名字，马燧心里便有了好感。他与韩弇原是故旧之交。韩弇为国捐躯，功在社稷，朝廷应该有抚恤才是。如今他的族弟千里奔波，寻找亲人，却落得困顿风尘，飘零无依，自己应该收留他。想到这里，马燧略一沉吟，便问韩愈：“你可读过书吗？”

韩愈偷眼看看马燧，见他并无反感，便接说：“小人虽说不上学富五年，才高八斗，但圣贤之书读了一些，只是未应过科举而已。”

马燧捋髯微笑：“你既有如此才学，何不跟老夫回府，教犬子读

书？”

有了安身立命之地，韩愈自然是求之不得，他没有丝毫犹豫，便跟马燧回了府第，教他的两个儿子马汇、马畅读书。至此，韩愈才算是结束了穷困潦倒的生活，暂时有了个栖身之地。

韩愈在马燧家生活了两年，大约在贞元五年（789）便又回到了宣城。这有他自己写的《祭十二郎文》为证：“吾年十九，始来京城，其后四年而归视汝。”在书剑飘零4年之后，又离开了京城，和嫂嫂、侄儿团聚去了。

韩愈回到了宣城，摒弃了一切杂念，他已经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科举考试上了。

在摩拳擦掌准备考试的日子里，韩愈真觉得度日如年。为了这一次考试，他凿壁偷光，悬梁刺股，受了多少苦楚！眼望捷旌旗，耳听好消息。考中了自然是从此出人头地，前程似锦，建功立业，名垂青史。但要是落榜了呢？许多年的心血岂不都付诸东流了？自己的一腔抱负自然也都无从说起了。为了稳妥起见，必须未雨绸缪，疏通一下关系。找谁呢？韩愈不禁踌躇了。他在屋里不安地踱着步，突然想起来了：此次赴长安应试，必须取道郑州，而滑州离郑州不远，在那里任刺史的贾耽是个古道热肠的人，说不定会助自己一臂之力。于是，韩愈经过精心准备，特地给贾耽送去了自己的行卷，希望得到他的提携和援引。

贾耽是我国古代少有的学者型的封疆大吏，后来又当了13年宰相。他性格恬淡，每从朝中归第，接待宾客，终日不倦，家人也未尝见其有喜愠之色。韩愈与他素昧平生，毫无交往，之所以要把行卷交给他，无非是因为他既当官又做学问，知道读书人的甘苦，或许能惺惺相惜，助他一臂之力。所以韩愈把希望都寄托在了贾耽身上！

信是捎出去了，但却泥牛入海，毫无消息，韩愈急得抓耳挠腮，贾耽却按兵不动。是贾耽不赏识韩愈的文字，没有把行卷送给主

考官，抑或是主考官不肯送这个人情，不得而知，反正韩愈的第一次应试失败了。

韩愈虽然铩羽而归，但并不灰心，贞元六年（790）他第二次参加了考试，考前又去过一趟河中，写了一篇《河中府连理木颂》。文中说，司空咸宁王浑瑊任河中尹、河东节度使的第七年（河中府即蒲州，开元九年改蒲州为河中府），木连理生于河中府的东邑。不用阅读全文，单看看题目及开头这句话，就知道韩愈要说什么了。古代的帝王或地区的行政长官，只要实行了仁政，便会有祥瑞出现，比如普降甘霖、凤凰来仪、一禾多穗、木生连理等。河中府出现了连理木，不言而喻，是说浑瑊在河中府任职时勤政爱民，因此感动天帝，在府的东邑长出了连理木。果不其然，接下来韩愈便一口气讲了浑瑊的五大德政。在这篇短文的末尾，韩愈又写了几句颂辞：“木何为兮此祥，洵厥美兮在吾王。愿封植兮永固，俾斯人兮不忘！”

韩愈为了求得浑瑊的帮助，又一次写了谏文。但是吹捧并没有获得回报，韩愈第二次名落孙山。

流年似水，转眼到了贞元七年（791）韩愈第三次参加考试，依然榜上无名。

愈挫愈奋，在三次考试失败之后，韩愈毫不气馁，决定第四次参加考试。他抱定了一个宗旨，不达目的，决不罢休，不管付出多大代价，他都在所不惜。

贞元八年（792）韩愈第四次应试，这一次果然如愿以偿。

四、受挫半生

韩愈进士及第，只是取得了入仕的资格，要想做官，还须通过吏部考试。贞元九年（793）韩愈应吏部的博学宏辞考试，考试前给韦舍人写了一封《应科目时与人书》的信件，希望得到韦舍人的援引。

“梧桐夜雨 几回无寐。”韩愈自交了卷子以后 就眼巴巴地等着入选的消息。然而他失望了。

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船迟又遇顶头风。正当韩愈名落孙山、心绪不佳之际，又接到了嫂嫂郑夫人歿于宣城的消息。这不啻是晴天霹雳，令他肝肠寸断！他不安地在馆驿里踱步。

贞元九年（793）秋，韩愈得知嫂嫂的尸骸已到河阳，便匆匆忙忙从长安回到了河阳。

为嫂嫂守完丧，贞元十年（794）韩愈又来到了长安，第二次应吏部试。

但这一次吏部考试，韩愈依然铩羽而归。在极度失望中，他从长安来到凤翔，想求得凤翔尹邢君牙的帮助。

尽管韩愈对邢君牙寄予厚望，不知是邢君牙戎务倥偬，不遑他顾，或是不屑答复，他对韩愈这封措辞恳切的信，竟没有理睬。这样，韩愈又怅然回到了长安。

两次应吏部试不中，韩愈并不灰心，又在准备第三次应试。就在这时，传来了挚友李观病笃的消息。

韩愈怀着悲痛的心情 写了一篇《李元宾墓铭》 抒发对亡友的悼念之情。这篇墓铭文字不长 但却写得情真意切 他说：“生而不淑 孰谓其寿 死而不朽 孰谓之夭？”

贞元十一年(795),28岁的韩愈第三次应吏部博学宏辞的考试,再一次败北。

屡试屡败,韩愈心情沉重,悲愤难抑。贞元八年和他同榜登第的侯继,一连写了两封信安慰他。韩愈复信表示,虽然仕途蹭蹬,但不坠青云之志。他说,他从小就好钻研学问,自五经之外,诸子百家之书,只要听说便去搜寻,只要得到便仔细阅读。但对于礼乐、名数、阴阳、土地、星辰、方药之书,还没有接触。如今入仕的人,对这些都不熟悉,但古代的人不懂得这方面的知识,就不可能成为贤人君子。他虽愚笨,“每读书,辄用自愧。今幸不为时所用,无朝夕役役之劳,将试学焉,力不足而后止。”单看这一段文字,韩愈显得还很豁达,考试没有通过,他并不怨天尤人,趁着空隙时间,要将过去没有机会浏览的礼乐、名数、阴阳、土地等书籍找来读读,直到啃不动时为止。

事实上,韩愈给侯继的回信不过是自我解嘲而已,受了那么多挫折,他不可能漠然无动于心。他一连给宰相上了三封书,希望能得到他们的重视。

命运又和韩愈开了-次玩笑,尽管他情恳辞切,而宰相却是铁石心肠,丝毫不为所动!

韩愈使尽了浑身解数,仍受挫于吏部,生活上也陷入了穷困之中。

贞元八年和韩愈一起中进士的崔立之,得知他三试于吏部而不中,写了封信安慰他,他也以书答谢。韩愈说,虽未得中,但并不惭愧,意思是说此乃天意,非战之罪。对于考中博学宏辞的人,韩愈嗤之以鼻:所谓博学,难道像现在的这些人吗?所谓宏辞,难道像现在的这些人吗?古代的豪杰之士,如屈原、孟轲、司马迁、司马相如、扬雄之徒,要是参加这种考试,必然心怀羞惭,自己也不要求录取了。让屈原等人和今日那些善于钻营者去竞争,只能受到屈辱。这5个人如果生于当世,他们的学说即使不能显扬于天下,也

会保持自己的尊严，肯与那些斗筭小人一争高下，并为此而欢乐忧愁吗？韩愈以屈原、司马迁等自况，表示不屑于与那些凡夫俗子并驱争先，其实都是些愤懑不平之语，要是真的那么超凡拔俗，他又何苦汲汲于功名富贵呢？

长安是待不下去了，宣城也无亲人可依了，就像是绕树三匝、无枝可栖的小鸟，他只能回河阳去。五月初二日，韩愈离开长安，束装东归。五月七日出了潼关，走得累了，坐在黄河南岸路边歇息，看见一行人提着精致的笼子，笼子里装着白鸟、白鸚鵡，气势轩昂地向西行走，嘴里不停地吆喝着：“路上行人赶快闪开！这是长官献给天子的礼物，谁堵塞了道路，定将严惩不贷！”听到吆喝，路上的行人连忙躲开，连正眼看一下也不敢。白鸟即白色乌鸦，也是一种瑞禽。史称邦国有道，瑞禽出现，德宗喜欢吹捧，地方官便以此讨好他。献白鸟者肯定不止河阳一处，各地的官员谁不想巴结天子，投其所好，为自己的飞黄腾达铺平道路呢？

看见进献瑞禽的人，韩愈不禁联想起了自己的身世，胸中陡然涌出生不逢时的苍凉之感，于是挥笔写下了《感二鸟赋》。在赋前还加了一篇小序。赋中慨叹自己“曾二鸟之不如”。那些鸟只不过是羽毛与众不同而已，既没有道德，也没有智慧计谋，既不能做朝中大臣，也不能辅佐天子对百姓施以教化，但是却能得到荐举至天子身边的荣耀，自己空有治国安邦之才，又哪里能得到明主的赏识呢？这样看来，人反不如鸟了。应当承认，韩愈虽然是为自己鸣不平，但对时弊的抨击，却是打中了要害，封建社会中像韩愈这样满腹经纶而不为当局所用，最后老死于户牖之下的例子，不是时有所闻吗？

韩愈虽然在仕途上不得志，但是学问却是大见长进了，这反映在他回到河阳后所作的《画记》上。这是一篇记述一幅名画的文章，也是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。文中记述人物之多，器物之盛，场面之逼真，人物、动物形态之异，使人如行山阴道上，目不暇接。清

朝人林云铭说 这篇文章是因画而作 但《画记》中有画 画也入神，记也入神。该文记人之事为一段，记马之事为一段，记器物为又一段，而其中穿插变化，摇曳多姿，使人几乎分不出头绪。凡画中所现 在文章中都历历如见 这就是世人所说的“入神”。这些称赞并非溢美之辞。

韩愈在河阳老家大约住了三个月，九月间他去东都洛阳。

贞元十二年（796）的春、夏两季，韩愈是在洛阳度过的。史籍中没有他如何生活的记载，但可以用两个字概括：穷困。当他踽踽洛阳街头、饥肠辘辘的时候；当他望着达官显贵轻裘肥马，仆从如云，从他身边疾驰而过的时候，他心中的悲愤是可想而知的。

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”正当韩愈穷途末路之际，突然遇到了救星，这救星不是别人，乃是韩愈叔父绅卿的挚友董晋。

贞元十二年（796）七月，韩愈二十九岁，受汴州（今河南开封）刺史、宣武军节度使董晋的辟举，出任观察推官，旋又试授秘书省校书郎（虚衔）。这是韩愈从政的开始。同年秋天，李翱从徐州来汴，随韩愈读书学文。后一年十月，张籍经孟郊介绍，也来到汴州，随韩愈学文。韩愈对自己在董晋幕府当一个僚属小吏当然是并不满意的。他在这年所作的《复志赋》中说：“伏门下而默默兮，竟岁年以康娱”；“情怊怅以自失兮，心无归之茫茫。”那种不得意的心情跃然纸上。但是，他并没有因此绝望，“往者不可复兮，冀来今之可望”。他认为将来还是很有希望的。韩愈在汴州近三年，已开始大力倡导“古文运动”。他除了指导李翱、张籍等人的日常学习，就利用一切机会，广为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。当时的文坛，作时文是一种风尚。这种文章有一定程式，它实际是后来八股文的先声。韩愈对这种文风极为反感，他决不随波逐流。他在汴州时所写的《与冯宿论文书》中，就明确表示了这个态度。他说：“他写的文章，往往自己‘意中以为好，则人必以为恶’，小称意人亦小怪之，

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。”反之，如果“作俗下文字”，虽自己下笔就感到惭愧，然而人家看了“以为好”；小惭者亦蒙为之小好，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。但他认为写这样趋时的文章，“何用于今世？”为了使文章能有益于世，必须“弃俗尚而从事于寂寞之道”，反对时文，提倡古文。

韩愈在任观察推官的近三年中，虽已有较固定的俸禄收入，但他娶妻、生女，又有堂兄韩弇遗孀、孤女来归，宣城韩氏家族亦有人来投奔，一时家庭人口骤增至三十口，生活的重担，使他不可能在生活上有很大改善。

贞元十五年（799）二月，董晋去世，韩愈护丧柩去洛阳。四天后，汴州兵变，行军司马陆长源等被杀。韩愈作《汴州乱》诗二首纪其事。二月底，韩愈在兵荒马乱中携家逃难到徐州，暂寓于符离睢上，这又使他在生活上陷入了困境。他在《与李翱书》中说：

仆之家本穷空，重遇攻劫，衣服无所得，养生之具无所有，家累仅三十口，携此将安所归托乎？舍之入京不可也，挈之而行不可也。……若仆无所依归，无簞食，无瓢饮，无所取资，则饿而死，其不亦难乎！

一个“家本穷空”的三十口之家，遇上劫难，没吃没喝，而且借贷无门，其困难处境是可想而知的。

同年秋，韩愈被他的故交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辟为节度推官。但他并不想任此职，如《龔龔》诗所说：“愿辱太守荐，得充谏诤官。”他希望张建封能荐他到朝廷当个谏官。韩愈与张建封最初结交，虽曾因马燧之荐，但主要是因文章而相惜，并没有共同的见解和真挚的友情。因而在韩愈成为张的幕僚之后，两人时有争执。他在翌年（800）春所作的《归彭城》一诗，就流露了对张建封不满的消极情绪。他曾写信给孟郊和李翱，倾诉他内心的苦闷，说他在张幕中

“言无听也 唱无和也 独行而无徒也 是非无所与同也”表示将在“今年秋 聊复辞去”(《与孟东野书》)。李翱深知韩愈内心的苦恼，劝他早日离徐去京。但没有等到秋天，张建封在五月就免除了韩愈的职位。韩愈对自己的这种遭遇 深有感慨 他写了一首《驾骥》诗寄赠欧阳詹，来抒发心中的愤懑。韩愈被免职后，即离徐归洛。这使他再度陷于贫困。他在《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》一诗中，便有“倏忽十六年 终朝苦寒饥”的哀叹。

贞元十六年(800)冬天，韩愈赴长安参加吏部铨选。翌年三月，顺利通过铨选，回洛阳待命。在洛阳待命期间，韩愈又就散文革新问题发表了不少重要理论。他在六月二十六日写的《答李翊书》，就是他阐述古文理论的一篇代表作。他把古文运动与儒学复古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，为古文运动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。